

卡莱斯·鲍什的民主理论评析*

孔卫拿

(厦门大学 公共事务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卡莱斯·鲍什是活跃于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界的知名民主理论研究者。立足于对既有政治发展与政治转型理论解释的批判性汲取, 鲍什发展出一个民主化转型的统一理论模型, 该模型强调一国经济不平等程度、资产专用性以及各阶级/集团的政治力量均势在民主转型进程中的关键作用。此外, 他还阐发了关于民主转型路径、民主的再分配效应以及民主的政治责任等理论观念。

关键词:民主; 转型; 不平等程度; 资产专用性

中图分类号: D0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681 (2014) 06-0040-04

作者简介:孔卫拿 (1985-), 男,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

一、引言

“为什么许多国家由非民主过渡到民主? 哪些因素决定了过渡发生的时间和方式? …… 这些问题是政治学、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 更一般地说, 是社会科学的核心问题, 但它们既没有普遍的公认的答案, 也没有人们普遍接受的分析框架。” [1] (p16) 的确, 民主转型究竟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或者说什么样的社会经济背景/条件更有利于民主转型, 这是民主转型理论研究中一直存在争议的问题。在民主化理论已经从政治发展范式过渡到政治转型的情势下, 加强对于域外政治转型理论界相关人物、理论、观点和方法的研究, 对于推动本土有中国特色的民主理论、推动我国民主法治建设, 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选取了当今正活跃于西方社会科学界的一位民主理论研究者——卡莱斯·鲍什作为述评对象, 以鲍什的一本民主理论著作兼其若干论文为线索, 总结和介绍其民主理论体系。文章将做出如下安排, 第二部分简要介绍鲍什的生平及其研究概况, 第三部分为本文的主体, 总结鲍什的民主理论, 包括内生民主化、民主化转型、民主的再分配结果以及民主制度的政治责任等。第四部分是对鲍什研究的一点简要总结和点评。

二、卡莱斯·鲍什生平及其研究概况

卡莱斯·鲍什 (Carles Boix),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教授, 伍德罗·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教授, 古根海姆学者, 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长期从事政治经济学和比较政治学领域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鲍什教育背景涉及领域广泛, 1985年6月于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获得法律学士学位, 次年6月

又在同一大学获得历史学士学位。此后受教于哈佛大学, 1990年6月获得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行政硕士学位, 1995年6月获得哈佛大学政治科学博士学位。这种多学科的教育背景, 也造就了鲍什日后在研究中虽专长但不拘泥于实证性定量分析的风格, 其理论问题意识、历史和比较分析的方法都很有深度。

鲍什著述丰富, 截止目前著作 (含译著、参编著作) 有7部, 其中《政党、增长与不平等: 世界经济中的保守党和社会民主党的经济战略》一书获得威廉·赖克 (William H. Riker) 政治经济学最佳专著奖。《民主与再分配》一书更是获得威廉·赖克 (William H. Riker) 政治经济学最佳专著奖和马太·杜干 (Mattei Dogan) 比较研究领域最佳专著奖的双料大奖。鲍什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美国政治科学期刊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世界政治 (World Politics)、国际组织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法律、经济与组织期刊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等一流学术杂志上发表了众多论文。

纵观鲍什的著述, 他的研究重心在于政治经济学、比较政治学, 但鲍什的理论体系中民主问题所占的比重也是非常可观的。上面提到的《民主与再分配》一书更是让他获得了较高的学术荣誉。当然鲍什的民主理论是嵌入在他擅长的比较政治经济学分析中的, 我们接下来就来集中介绍鲍什的民主理论思考。

三、卡莱斯·鲍什的民主理论

(一) 内生民主化

经济发展与民主之间的关系实太过于纷繁复

收稿日期: 2014-05-11

* 基金项目: 厦门大学研究生基础科研创新基金项目 (201222G005) 的阶段性成果。

杂，以至于这个命题至今尚没有定论。自利普赛特 (Lipset) 首先提出民主与经济发展正相关的观点以来 [2]，这方面的研究从未停止过。这方面的理论资源主要呈现三种研究类型，首先是政治现代化理论，中间经历了制度形成的社会学理论，以及新近出现的制度均衡理论。在这个理论演进过程，以亚当·普沃斯基 (Adam Przeworski) 为代表的外生民主理论观点尤其引人注目，也引发了诸多争议。

1997年亚当·普沃斯基和弗兰多·莱蒙基 (Fernando Limongi) 发表了《现代化：理论与现实》一文，重新检验了“经济发展有利于”民主这一经典论断，重点检验了其中一个难以定夺之处。即为什么富国之中民主国家的比例高于穷国？如果是因为经济发展增加了穷国发生民主转型的可能性，这被他们称为“内生”的民主化理论。反之，如果是因为经济发展使得已经建立起来的民主政权得以保持而不易蜕变为独裁统治，他们则称之为“外生”民主化理论 [3]。利用 1950-1990 年跨国数据库的定量统计分析，他们发现一个国家民主崩溃的可能性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而下降，而民主化的可能性与此无关。普沃斯基后来的陆续作品中一直坚持着这一看法 [4]。也就是说，普沃斯基坚守的是经济发展有利于维持巩固既存民主的“外生”民主化理论，而反对经济发展会促进民主化转型的“内生”民主化理论。

对此，鲍什在全面处理样本选择及其模型规范的基础上，重新检验并批驳了这一观点，再次支持了经济发展对于民主化具有很强的内生作用。鲍什和苏珊·斯托克斯 (Susan C. Stokes) 的《内生民主化》一文从理论与事实两方面对普沃斯基的理论进行了驳斥。首先是理论方面，鲍什指出外生民主化理论的前提，必须是假设经济发展在民主社会里能诱发某些因素维持民主，但在专制社会中却不会诱发某些因素以促成民主化。但现实中却存在独裁国家收入水平增高时，增加了当权者民主化动因的现象。因此，普沃斯基等人的理论前提存在问题。再是事实层面，他们又分三个层次进行了一一驳斥。第一，收入水平划定的问题。普沃斯基等人对于独裁国家发展实现现代化的人均收入水平，划定在 4115 美元。这是比较主观和武断的，“为什么人均收入从 1000 美元发展到 2000 美元，或者从 2000 美元发展到 3000 美元的国家就不叫发展呢？” [5] 重新划定收入水平并控制一些变量后，鲍什与斯托克斯的统计模型发现，外生化和内生化的作用都在发挥作用，民主化的可能性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也增加了。第二，样本选择的问题。普沃斯基等人的样本只有 1950-1990 年的数据，鲍什认为这会低估经济发展对于民主化的巨大内生作用，因为这样的样本没有考虑没有民主存在的时点，1950 年的时候经济发达的国家都已经实现了民主化。所以鲍什将时间延伸到早期工业化刚开始的时候，整合了 1800-1949 年和普沃斯基的 1950-1990 年两个时段的数据，同样发现人均收入的增长可以提高民主化的可能性，只不过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增长这种提高的速率是下降的。第三，控制变量的问题。普沃斯基等人的理论模型中忽视了一些重要的控制变量，尤其是一国资本的流动性，鲍什将其一一加进来仔细进行实证分析讨论，在加入这些控制变量后，经

济水平对于民主化转型的证据依然稳健 [5]。

经济发展能够引发独裁向民主的转型虽然在统计上得到了验证，但这需要解释其内在的机理，为什么经济发展会有助于独裁向民主转型呢？既然传统的政治现代化理论遭到诸多批评，看来还得另辟蹊径。鲍什等人在该文中简单透露了收入分配因素的影响，但更详细、更全面的论证不是这篇论文所能完成的，这是《民主与再分配》一书的重中之重。

(二) 民主化转型

1、民主转型统一的因果解释模型

鲍什指出，既有的民主化理论资源，在对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因果分析上是远远不够的，总体上看“仍然缺少一个令人信服的政治发展与转型理论” [6] (p1)。正是在批判性借鉴和吸收前述民主化研究领域三种研究类型的理论资源，鲍什提出了一个系统的、统一的民主化理论因果解释模型。

鲍什先是设定了一些前提，比如政治制度是集权中体现该制度下个体理想分配偏好的机制。在民主机制下，所有的个体都参与投票；而在专制制度下，资产的最后分配方案只会顾及社会部分人群的偏好。正是由于不同制度带来的分配结果大相径庭，所有个体都支持能够实现其可支配收入最大化的政治决议。而任一个体的政治策略会受到其所掌握的经济资产数量和类型而发生变化，同时还受到其为实现目标所必须承担的成本制约 [6] (p8)。在有了这些前提后，他利用梅尔策和理查兹等人著名的实证赋税论，搭建了一个基本的形式模型，该模型包括理性的个体、个体的经济结构、政治制度的类型以及不同的分配后果 (博弈均衡)。通过一番形式逻辑的论证后，鲍什抛出了自己的理论假设：政治制度的选择 (民主制、威权制、左翼专制政权) 是财富分配、经济资产的属性以及不同社会群体政治力量均势共同左右的结果 [6] (p47)。具体来说，这个模型中的三个因素的作用机制体现如下：

第一，财富分配就是指经济领域的平等程度，经济平等程度的提高能够加大民主制度建立的可能性。因为个体间的收入分配更加平等，最贫困的社会阶级向富裕选民提出再分配要求的压力将有所降低。而资产所有者需要支付的赋税最终不会太高，低于他们排斥多数民众所需的镇压成本，这样他们会选择接受普选制 [6] (p9)。换句话说，财富分配越平等，经济紧张程度会越缓解，富人更加倾向接受民主制，因为选举对富人消费水平的影响微乎其微。反之，如果财富分配不平等加剧，重新分配的需要就会增加，民主制下最终税率也将随之增加。富人的威权倾向会增强，民主化和民主制度存在的可能性继而降低 [6] (p31)。

第二，经济资产的属性是指经济资产的流动性，经济资产的流动性增加，税率必须降低，否则资本持有者会由此将资产转移至国外，而且，当资本能够轻易向国家隐瞒，或者只能受所有者支配，没收资本的可能性也会随之降低。这样来自非资本持有者的再分配压力有所降低，继而减少了政治冲突，民主出现的可能性将增大 [6] (p10)。也就是说，资本流动性增加，选民会同意推行相对较低的税率，这样对于资本所有者而言，掌握国家的成

本要高于自己缴纳的税负，因而资本家对民主制的反抗消失。反之，如果资本流动性较低，该资本对税收的敏感度不高，选民会选择征收重税，导致资本持有者会尽可能阻止民主制建立 [6] (p32-33)。

第三，不同社会群体政治力量均势是指个体/阶级间政治资源（用来压制或战胜对手）如组织、技术资源的分配，这种资源的分配对比会纳入到政治精英的镇压成本和反抗者的政治暴力考量中。这第三个因素在博弈过程中是与前两个因素紧紧相连的，当不平等程度和资产专用性处于低水平时，民主制下的税率会相当低，富人的优势策略是建立民主，不会有什么冲突；当不平等程度和资产专用性处于中等水平时，取决于镇压成本，镇压成本较低，富人就会选择镇压而不是民主选举，镇压成本较高，富人就会选择民主宪政；当不平等程度和资产专用性处于高水平时，许多情况下富人宁可选择镇压而不是接受民主；最后，当不平等和资产专用性达到过高的水平时，阶级之间的对立就不可避免了，经常表现为内战或革命 [6] (p27-29)。

为了验证这种理论框架，鲍什展开了他娴熟的实证检验，检验以两种方法进行，第一种方法仍然是他最擅长的定量统计检验，鲍什搜集了两组数据，时间跨度都很长，分别是 1950-1990 年和 1850-1980 年跨国数据，以不平等、财富专用性等作为自变量，以民主政权建立或民主政权崩溃几率为因变量，利用多年度跨国数据统计性描述与回归分析，支持了作者的假设。之后，鲍什进入到第二种检验，即历史分析。鲍什仔细阐述了中世纪晚期到 19 世纪中叶的瑞士诸州和殖民时期至 20 世纪中期的美国各州，分析这两个案例“以确定不同政治参与者、经济参与者在政治体制选择中的偏好和策略，克服纯统计研究的局限性” [6] (p102)。

同样也发现民主的引入与巩固主要与该国的不平等程度以及资产专用性相关。最终，不平等程度和资产专用性的共同作用能够解释政治暴力的爆发 [6] (p117-118)。

当然，统一的理论解释模型并不是说，要排斥其他一些变量对于民主概率的影响。鲍什在验证完其解释模型后又探讨了 4 个因素对于民主概率的影响，分别是经济增长、社会流动性、贸易和政治制度。但这些变量的影响都是有条件的，并没有鲍什那个统一模型中三因素的作用那么直接。

2、民主转型路径

奠定在既有的理论解释模型基础上，鲍什明确地提出了通往民主之路的途径，他认为从历史角度看，民主制取代威权制主要是通过两种路径。当然，这两条路径是与他所一直强调的影响民主的经济不平等、资产专用性、社会群体间政治力量均势的解释模型分不开的。

第一条路径源自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商业资本主义以及随后的工业起飞导致财富的增加，非流动性资产和自然资源价值的相对降低，并且推动了经济的平等化。这些条件使得之后向自由民主制度的转型成为可能。这种经济—政治转型过程是呈波浪式向前推进的。这种转型路径首先发生在北大西洋的具有各自风格的若干地区——英国、比利时、荷兰、德意志的莱茵地区、瑞士以及美国北部诸州、南欧、战后东亚等 [6] (p13)。

第二条路径只可能通过强大的暴力行动实现——一般通过外国列强的军事入侵完成。因为在那些经济尚未发生现代化的社会，封建势力是不会允许通过经济及制度改革实现平等的，因为这会威胁到他们不可一世的权力。即便是有如日本的明治维新，也是对外国军事入侵的一种回应。所以，这种社会中的威权精英的破灭只有通过被战败或者被外国占领才可能实现 [6] (p14)。代表性国家和地区有日本、二战后的德国和意大利、韩国和中国台湾、苏联解体后的东欧等。

(三) 民主的再分配结果

内生民主化、民主化转型都是把民主制作为一个目标（因变量）来探讨，分析导向民主制度的社会经济起源。但民主制度一旦建立，其再分配（经济结果和财政安排）与威权制有什么差异呢？换句话说，社会中的个体或群体为什么在特定情势要孜孜追求民主呢？如果我们认同鲍什的那个前提，即每种政治制度都是某一社会通过整合个体偏好继而实现经济资产理想分配的特定机制，所有政治参与者都拥有相应的适当策略以保障对自己最有利的政治制度，实现各自福利最大化。我们就很容易理解，必须要探讨民主制下的再分配与威权制下再分配，才能厘清这个为什么要走向民主的问题。

鲍什的一篇题为“民主、发展与公共部门”的论文就是集中探讨这个问题，后来在《民主与再分配》中的论述主体皆出自这篇文章。鲍什仍然是建立了一个模型，认为政府公共部门的发展是经济发展和相应的政治制度合力造成的结果。作者使用了 1950-1990 年 65 个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面板数据，指出经济发展影响公共部门的发展是通过两种机制：第一，国家干预来提供特定的公共物品如规制机构和公共设施；第二，工业化和不断老龄化的人口继而提出更高的以失业救济金、医疗保险和养老金为形式的转移支付需求。当然，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强烈地依赖于相应的政权类型和选举参与水平。在民主政权下，政治家要回应选民的需求，所以导致公共部门是随着与经济发展有关的结构变迁平行增长，但在威权政权下，公共部门的规模仍保持较小 [7]。后来，鲍什把民主制度下再分配结果的影响机制又进行了细化，用实证统计证明，选举参与、选民的经济风险分布以及不同人群再分配要求类型，是民主政权下影响公共部门扩张的重要因素。在鲍什看来，决定公共部门发展的主线始终都是“社会利益和选举偏好的结构” [7]。

(四) 民主制度的政治责任

上述所有的论述有一个共同前提，个体与代表之家的利益、政治策略被认为是一致的。比如说政治保守派和军方干预力图保证的是资本家的财产权，倾向自由主义的国会议员要扩大的是中产阶级的发言权，贸易联盟组织者和左翼党派的官僚则为扩大劳工福利而努力 [6] (p13)。但是这就忽视了政治经济学中一个核心问题——“委托—代理”难题。委托人代理人经济理论首先是针对私营部门中股东和管理者关系而发展出来的，委托人和代理人目标和信息都存在偏差，代理人有可能追求自身利益。“如果说私营部门中存在代理问题，在公共部门中则更为严重” [8] (p15)。鲍什对这个问题有认识，所以他也自陈，“政治转型过程中，除了

有各社会部门之间‘水平的’冲突，还存在着统治者与其选民之间的‘垂直的’冲突，对此我们应当有所关注” [6] (p192)，这就要涉及到政治责任的问题。

鲍什指出，既然研究者们一般认为，委托-代理问题的解决在于建立一个控制机制，比如定期的选举，从而规范决策者的行为。那么有理由认定，专制国家的政治责任低于民主国家，而腐败高于民主国家。因为，民主国家的选民是回顾性投票，选民为时任者投票前都要回顾他过去的政绩，选举迫使决策者向公众负责，在下次选举中下台的威胁会逼迫决策者提供更好的服务，克制自己提取租金的举措。而威权体制下，合法性虽然也建立在一定程度的漠然容忍或人口的最低支持基础上，但还要运用镇压维系统治。专制政府被赶下台的威胁通常低于民主内阁，导致威权制下的政治精英比民主国家民选的政治家有更大的余地侵吞收入。在这样的对比性前提假设下，鲍什提供了一些民主和非民主政权下，不同程度的腐败和寻租以及民众信息水平差异的经验数据，统计分析显示，威权制下的租金挪用比民主制下更加严重 [6] (p197)。

因此，鲍什总结认为，民主制能够自我维系其均衡状态：民主制度的重要特征——责任机制能够将国家的腐败程度以及向决策者的资产转移控制到最低水平，政治操纵难以撼动最初有利于民主转型的条件。相反，在威权制度下，公民很难监督决策者，租金挪用程度较民主制高出许多。所以，民主的政治责任本质是指，民主制下的政治家难以破坏结构性条件的方式来改变资产的分配方式，从而使得民主制度近乎一个“自我维系”的体制。

四、点评与总结

我们现在来对鲍什的民主理论进行一下总结。第一，从研究主题来看，鲍什的民主理论典型的属于民主化研究领域，并且是处于已经经历变迁后的政治转型理论范畴。二战以后受现代化理论的影响，西方社会科学界兴起了对广大亚非拉新独立国家的研究热潮，民主化理论研究的主导性范式是政治发展范式，政治发展范式坚持三个基本假设，一是“分类假设”，把全世界国家和地区划分为“三个世界”；二是“条件假设”，强调经济是政治发展的重要条件；三是“单线进化假设”，采取传统/现代二元划分的模式 [9]。这种主导范式在 20 世纪 80 年代晚期已经逐渐衰落，以“条件假设”为例，政治转型论者们已经逐渐认识到，经济发展仅仅是民主转型的一个必要条件但绝非充要条件。林茨等人著名的民主转型与巩固理论就已经指出，民主转型与巩固需要有活力的公民社会、相对自主的政治社会、法治、可资利用的官僚组织和市场社会 5 个相互作用的领域条件 [10] (p7)。鲍什对传统现代化理论在解释民主化方面的不足是有明确意识的，他虽然也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分析模式，但该模式设计综合了博弈论、制度主义、行为主义等多学科知识体系和方法，充分体现了鲍什所强调的应该建立替代性政治转型理论的雄心和抱负。第二，从研究视角来看，鲍什的理论体系更侧重于强调民主化的社会经济起源条件。该理论体系中经济不平等程度、资产专用性等变量，均系一个国家在实现民

主化转型过程中的重要社会经济背景和条件。这一对社会经济变量，在鲍什的民主理论中始终基于主导性地位。第三，从研究方法来看，鲍什的民主理论不是政治哲学叙事框架下的民主理论，而是实证科学指导下的民主理论。鲍什通过对既有实证研究的梳理，建立自己的计量模型，以数据说话，并以历史材料作为辅助。将实证科学的计量研究与历史分析结合在一起，作证自己的研究假设。

最后，鲍什的研究和解释对于我国本土民主理论研究，应该说还是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的。针对一些学者对中国通过和平的“韩国”模式迅速实现民主化的预测和估计，鲍什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这个乐观的预测忽视了中国的根本问题：它内部的绝大差异，而且由于沿海与内地之间收入差距的日益扩大，这个问题也进一步恶化……中国地区间严重的收入不均很可能导致各地之间的冲突，最终引发国家的分裂。除非资本实现充分流动能够逃避税收，否则沿海地区会出于纯粹的再分配原因——即避免地区间大规模的转移——抵制民主制的引入。” [6] (p222) 应该说，鲍什的这一评论是非常客观、冷静和理性的，城乡、地区和阶层间的巨大不平等的确有把中国拖入“断裂社会”的危险，这种不平等程度对于民主建设来说是非常不利的，至少在鲍什的模型看来存在这种困境。

当然，民主化转型的经验现实是异常复杂的，构建统一的实证模型往往是理论家们窥视现实、解释现实的重要工具和方法，但是这也许是一项难有止境的工程，鲍什的努力也只是这一浩大工程中的一个断面，这就需要我们更加专注于国际国内的民主建设经验现实，具有国际性比较视野，以理论连接现实的科学态度和方法，不断推动政治转型、民主化理论的深入发展。

参考文献：

- [1] 达龙·阿塞莫格鲁，詹姆斯·罗宾逊. 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专制和民主的经济起源[M].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
- [2] Lipset S.M. 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J].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59 ,Vol.53, No 1.(Mar.).
- [3] Przeworski and Limongi. Modernization : Theories and Facts[J]. World Politics, 1997 49(January.).
- [4] Przeworski Adam, “Democrac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C]. In Edward D. Mansfield and Richard Sisson eds. 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Knowledge. Columbus :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4. [5] Boix Carles and Stokes Susan. 内生民主化[J]. 开放时代, 2008 (2).
- [6] 卡莱斯·鲍什. 民主与再分配[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 [7] Boix Carles. Development, Democracy, and the Public Sector [J].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01 45(January.).
- [8] 欧文·休斯. 公共管理导论.2nd [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 [9] 王金红，黄振辉. 从政治发展到政治转型——当代民主化进程研究的范式转移[J]. 开放时代，2009 (7).
- [10] 胡安·林茨，阿尔弗莱德·斯泰潘. 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 刘强)